

恽代英与图书馆事业

□ 靳萌萌

图书馆是传承人类文明、传播知识信息、开展社会教育的重要机构。革命先驱恽代英非常重视图书馆的职能作用，认为“图书室是传播文化的利器”，他不仅具有先进的图书馆建设理念，而且积极投身实践，为推动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打造家庭图书室, 将私人藏书对外开放

恽代英出身书香门第，家中藏书丰富，自幼博览群书、文笔出众。在武昌中华大学读书期间，恽代英广泛阅读中外书籍，常到文华公书林（图书馆）借阅图书，也曾到外语学校阅览室参观。这些新式图书馆开放有序的管理方式使其深受启发，于是萌生了整理家藏的想法。1917年7月，恽代英与弟弟恽子强分工合作，利用暑假对家庭藏书进行整理，并取名为智育社图书室。

从智育社图书室的建设中，恽代英摸索出一套个性化的图书分类和管理方式：一是自创分类法，便于管理图书。即在传统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法基础上予以拓展，以学科为主对书刊按照经学、哲学、文学、科学、图表、杂志等类别进行分类，再辅以数字顺序、书名、册数、作者、价格等基本信息。二是编制书名索引，便于查找。书目依据汉字笔画顺序排列，同类图书用顺序号区分，方便书目查找。三是制定借阅规则，供他人借阅。四是加工图书，便于区分。每本图书均盖藏书章、粘贴标签，用以区分非智育社图书。智育社图书室建成后，恽代英称之为“此事终今夏一大成绩也”。

智育社图书室是恽代英精心打造的家庭图书室，虽为家藏，但对外借阅，冲破了当时私人图书“藏而不宣”的极具先进性。在图书整理中，他摸索出一套目录编制、图书分类、标签粘贴的清书流程，分门别类、有序规范，极具获得感。至此，恽代英每到一处，就想着开办图书馆。

创建社团图书室, 学习和宣传新思想新文化

20世纪初，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先进的知识分子纷纷通过组建社团的方式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1917年10月，恽代英发起创建了进步社团互助社，在青年中开展互助实践活动，后又倡议在互助社宿舍中建立图书室，购置书报。

1918年6月，互助社创办的启智图书室在中华大学校门口正式开放。恽代英主张“设公共图书馆以交换所有书籍，并公之大众”，号召社员捐书寄



恽代英



利群书社旧址

存，供人借阅，初具“知识共享”的先进理念。他身体力行捐赠智育社图书室藏书，允许校外学生借阅书刊。在藏书方面，恽代英认为相比于大部头的旧书，最近出版的杂志和新书更为重要，他用自己写作换取的书券购买最新的书刊放置其中。在管理方面，启智图书室定制了专用书架，编制图书分类目录，图书外借记录登记造册，个人寄存以供阅览的图书加上特别标记，以便他日归还书主。在服务方面，内容和形式都有所创新，设立了书报代售处，推广《新青年》《新潮》《新教育》《新中国》等进步书刊，兼具书店的功能。启智图书室规范管理，秩序井然，学生乐于在此读书自学，新文化报刊更是吸引青年学生来此借阅，从门可罗雀到门庭若市，深受欢迎。恽代英在日记中提到：“即如本校的文化启智图书室是个很大的帮助，许多人都承认他。”

在启智图书室的带动和影响下，上海同济医工专门学校的学生将私人书籍陈列在一起，供人阅览，后逐步演变为同济大学图书馆。此外，武昌的启黄中学建立了启黄图书馆，汉口商人建立了书报阅览室，大大推动了武汉地区新文化的传播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经营图书馆式的书店, 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1919年五四运动的浪潮席卷全国，6月，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建立，恽代英起草了《武汉学生联合会提出对于全国学生联合会意见书》，基于互助社和启智图书室取得的成效和经验，明确提出“会所应设图书室”，帮助青年学生了解世界新知识和新潮流。在意见书中，恽代英制定了藏书规划，指出购书款应由会费支付；图书选购要围绕学生的需要，购置最新的书刊、新旧图书、重要的参考书；国内出版的杂志报纸应全部购买，国外出版的及其他新旧报刊，可按需购买、择优购买；号召捐赠图书，充实藏书。五四运动时期，恽代英追求书刊内容的先进性，认识到进步书刊是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重要手段，图书馆可以为青年学生提供学

习和交流的空间，这些办馆理念在之后利群书社的经营活动中不断得以实践、逐步完善。

1920年2月，恽代英、林育南等创办了利群书社，用以宣传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兼具书店和图书馆特征的“文化运动场所”，“不在营业，在于介绍文化”。书社依照图书馆模式，报刊开架陈列，学生可以自由翻阅和购买，“不买的人，尽可以在营业的地方观览，算兼办了图书馆一样”。利群书社书刊采购不以销售多寡作标准，坚持“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差异化原则，主要售卖别处不易买到的、宣传新思想的书刊，包括《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新青年》《新潮》等多种新文化报刊，借此凝聚起了武汉大批爱国青年。董必武、陈潭秋、施洋等都曾是书社常客，这里成为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的基地。

在利群书社的影响下，毛泽东在湖南长沙建立文化书社，随后南昌、重庆、开封等地也纷纷建立书社，极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921年6月，利群书社在军阀混战中被毁，1985年恢复重建，至今依然发挥着传播文化的作用。

革新学校图书馆, 服务师生和教学工作

恽代英长期从事教育工作，高度重视图书馆在教学和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与社会价值。1921年10月，恽代英应卢作孚邀请去四川泸州川南师范担任教务主任，致力于教学改革，革新图书馆也是重要一环。当时的川南师范图书馆陈旧封闭，重藏轻用。恽代英锐意改革，一是开放图书馆，新报刊实施开架阅览，图书允许外借，打破对小说的偏见，允许学生借阅。二是补充馆藏，申请经费支持。1922年，恽代英利用暑假专程赶赴上海为学校购置图书、教材和仪器。川南师范图书馆从封闭到开放，从存古到知新，文化氛围焕然一新。

恽代英走上革命道路之后依然关注

图书馆事业。北伐战争期间，恽代英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担任政治总教官，邀请魏以新担任该校的图书馆总管理员。恽代英给予购书经费并亲自拟定采购书单，使馆内藏书应有尽有、门类齐全，包含政治、经济、历史、哲学等不同学科，到访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教官对藏书质量给予充分肯定，也受到学校师生欢迎，图书馆座无虚席。按照恽代英的要求，图书馆铅印图书目录、定制文华公书林尺寸的标准书架、采用最新的杜式（定友）图书分类法，这些做法堪称“专业”。在武汉时局动荡之时，他还特意叮嘱将全部图书以及书架等家具登记造册移交湖北省立图书馆。该校图书馆与时俱进、科学管理、注重保存，这些专业的做法很有先进性。

共建公共图书馆, 推进社会文化教育

恽代英一直致力于社会教育事业，希望普及教育，振兴中华。1920年4月，恽代英推动成立了湖北平民教育社，并在起草的简章中提出建立“平民图书馆”“平民阅报处”。他认为建设图书馆、阅报处等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对教育民众、开启民智尤为重要。

在泸州川南师范任教期间，除革新校外，恽代英还致力于推进社会教育活动，积极创造条件，将建设“平民图书馆”的理念付诸实践。1921年，为更好宣传新文化和革命思想，在卢作孚的支持下，恽代英和萧楚女在泸州城内治平寺建立了报刊阅览室，俗称白塔寺图书馆。该图书馆是由寺内的大雄宝殿改建而成，一层为阅览室和借书处，二层为讲演厅及书店，每年约有1200银元作为常年经费，通过募捐购置了价值3000银元的图书。恽代英号召有识之士捐赠私人藏书，朱德将驻防泸州五年的个人藏书均捐赠给该馆。经多方努力，白塔寺图书馆藏书达10余万册，类型多样、中外兼有，馆藏中外文的科学读物、马列书籍、进步报刊等。在当时闭塞的川南地区，白塔寺图书馆对推动泸州文化发展、传播新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

恽代英热心倡导图书馆事业，一生中参与创建了多种类型的图书馆，广泛服务于文化传播和革命运动。他将自身对于图书馆建设的独到见解和先进理念不断付诸实践，有效推动了图书馆的改革与发展，成为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的重要开拓者。

红色记忆

中国象棋是一种古老的棋类游戏，距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32枚棋子，布局谋篇，进退攻守，变化多端，气象万千。闲时与人对弈，不仅赞叹于象棋在军事谋略上的逼真模拟，更感慨于蕴含在其中的深奥道理。

锚定目标。不论是干事业还是做事情，在未着手未“落子”时，都会设定一个目标或一个预期，但要实现这个目标、达到这个预期，往往要经过一个较长的过程，或许多环节、要素的积累。就好比要达到赢棋的目的，往往要经过漫长的斗智斗勇，在这个过程中，所要面对的战斗、战役和问题、困难林林总总，局势变幻莫测，人若被约束、桎梏在对一子一隅的苦苦思索中，忽视甚至忘却了自己的最终目标，就会“撿了芝麻丢了西瓜”“赔了夫人又折兵”，最终导致失败。因此人不管前行的道路上是有鲜花还是有荆棘，是被诱惑驻足还是需逢山开路，都要时刻不忘为什么出发，锚定自己设定的目标。

有舍方有得。一方的16枚棋子，15枚是为了拱卫己“帅”，同样这15枚也是为了“将”死对手。任何一场对弈，都不会出现一子不失的战果。被动失子应叫“弃”，主动弃子才叫“舍”，棋手对弈的过程就是处理舍与得的过程。无舍将无得，有时舍是为了“拱卒”，有时是为了“跳马”，有时是为了“将军”，有时是为了保“车”、保“帅”，保持均势。舍是为了得，因此要学会精妙的舍，追求高明的舍，要让舍不白舍，小舍大得，少舍多得，但切忌妄想不舍只得。即便遇到不舍只得的情況，也要认清这种得是否源自对方的失误，还是对弈中的“陷阱”布局。有舍方有得，收获应出自耕耘和付出，我们应从棋中悟出舍得亦是人生的一种智慧和态度，摒弃“贪得”“躺赢”等念头。

识人之才，用人之长。汉高祖刘邦自认为运筹帷幄不如张良，安民筹饷不如萧何，治军带兵不如韩信，但能知人善任，从而得以在楚汉相争中战胜项羽。这表明了知人善任对于领导者的重要性。执子对弈，己方16枚棋子，如何调兵遣将、攻城拔寨，恰似一个团队的领导如何识人之才，用人之长。作为统军之帅，一方面要客观认识自身的实力，有五

棋中偶悟

□ 高谱

兵、二马、二炮、二车，就要用好这些兵、马、炮、车，抱怨“五个手指头不是一般齐”是没有用的，这是每一个团队都要面对和接受的客观实际，这是运筹帷幄的基础；另一方面要用人以长，看到兵、马、炮、车各有所长：兵行虽缓，但仍具有威胁，过“河”后能够有效牵制对方兵力甚至成就最后的“绝杀”；马虽有“蹩腿”之虞，但走“日”斜行，常常能够在腾挪间出其不意，更有“连环马”攻守兼备，自成“堡垒”；炮虽需有架方可攻出，但擅隐蔽、能借势，既可抵近阻敌，又可远程闪击。执棋者如同团队的领导，对手下员工从性格到能力，从作风到特长，乃至个人的习惯、家庭的影响，都要纳入考虑，从人的客观实际出发，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岗位，发挥其所长，实现“整体战”，做到各得其所、各展其才、各显其能。



竹是一种自然植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更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和精神象征，千百年来被赋予了君子的道德含义，寄托了人们对美好品质的向往和追求。

早在《诗经》中，古人见竹疏朗洒脱，便想起君子。到了唐宋，人们则直接将君子与竹子的德性相关联。唐代刘岩夫《植竹记》曰：“君子比德于竹焉”。宋代欧阳修说：“竹色君子德。”至明代，从黄凤池辑有《梅竹兰菊四谱》开始，竹便被称为“四君子”之一。竹之德包括诸多方面，唐代白居易在《养竹记》中写道：“竹以贤，何哉？竹本固，固以树德；君子见其本，则思善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见其性，则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以体道；君子见其心，则思用虚受者。竹节贞，贞以立志；君子见其节，则思砥礪名行，夷险一致者。夫如是，故君子人多树之，为庭实焉。”白居易将竹子之德概括为“本固”“性直”“心空”“节贞”，并逐一指出对于君子的对应教益，可以说对竹子君子品格的推崇，无以复加。故“竹如君子，君子如竹”的观念深入人心，传统社会的人文雅士、仁人志士常常以竹明志，寄情于竹。

“本固”是竹的天性。作为“岁寒三友”，竹临风傲雪，越冬而不凋；随地而生，不择地势和土壤。“露涿铅粉



竹的君子之风

□ 梅会林

节，风摇青玉枝。依依似君子，无地不相宜”，在唐代刘禹锡的这首《庭竹》诗中，竹子这种“无地不相宜”的特性正是“依依似君子”。清代郑板桥在《竹石》诗中写道：“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把竹子立根牢固、坚忍不拔的物性描绘得淋漓尽致。

“性直”是竹的特质。竹外直中空，枝干挺拔直立，有宁折不屈之气概。宋代韦骧的《咏竹》：“此君坚直本天然，岂学妖花艳主轩”，借赞美竹子的挺直表达自己的正直秉性。王安石的托竹言志：“人怜直节生来瘦，自许

高材老更刚。曾与蒿藜同雨露，终随松柏到冰霜。”竹子曾与蒿草、蕨菜一同享受雨露的滋润，但是它最终伴随松柏傲然挺立于结冰凝霜的寒冬。王安石推进改革，虽遇重重阻力，依然不改其志，他以竹自况，写出了自己正道直行的意志和勇气。

“心空”是竹的品格。白居易在《池上竹下作》写道：“水能性淡为吾友，竹解心虚即我师。何必悠悠人世，劳心费目觅亲知。”长庆四年，白居易的杭州刺史任满，改任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这年秋天，白居易来到洛阳定居，写下了这首诗，借竹子的空心道出了一个人修身养性、治学待

人的正确态度。宋代徐庭筠的《咏竹》“未出土时先有节，便凌云去也无心”，更是把竹子淡泊谦逊的品格写到了极致。

“节贞”是竹的风骨。南北朝刘孝先的《咏竹》曰：“竹生荒野外，稍云耸百寻。无人赏高节，徒自抱贞心。”青翠的竹子常常生长在荒野之地，长长的竹梢高耸入云，尽管没有人欣赏它的高洁，但它依然抱有坚贞不变之心。唐代岑参在《范公从竹歌》中写道，“守节偏凌御史霜，虚心愿比郎官笔。君莫爱南山松树枝，竹色四时也不移。寒天草木黄落尽，犹自青青君始知”，借竹子守节情操抒发自己的

情怀。

宋代宋祁的《竹》，则将竹的修、直、节、空融为一体：“修梢出类，辞卑不肯从。有节天容直，无心道与空。”第一句写竹修长挺拔，出类拔萃；第二句写竹的挺直孤傲，每枝都独立不成群的性格。“辞卑”，拒绝低头，与后句“有节天容直”呼应。“节”，有气节。由于竹的气节高尚，上天也容许它直立向上。最后一句写竹的虚心，对竹发出了由衷的赞叹。

除了以竹入文，以竹入画亦是古人的一大雅好。诸如宋代的文同、苏轼，宋末元初的赵孟頫，明清时期的徐渭、夏昶、郑板桥、石涛等人都是

画竹的大师。其中不少人还是写竹、画竹两者兼修，达到很高的造诣。

在历代清雅人士中，种竹养竹、敬竹仰竹之风颇为盛行。晋代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写道：“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描绘了一种淡和幽密、超凡脱俗、潇洒空灵，令人仰慕之境。王羲之第五子王子猷更是到了爱竹成癖、恋竹成痴的地步，据《世说新语》记载：“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魏晋名士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常在当时的山阳县竹林之下，喝酒、纵歌，肆意酣畅，世谓“竹林七贤”。他们远离尘嚣和权势，追求心灵的自由和个性的不拘，可谓清高、洒脱的文化标志。苏轼在《於潜僧绿筠轩》中直言：“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

竹以其生态特征、人文情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元素，让人感受到千古流传的卓尔不群君子之风。

